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

王海龙[1]，李英杰[2]，代兴梅[2]

（1. 沈阳农业大学，沈阳 110866；2. 沈阳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 110866）

摘 要：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由路径。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已有相关研究，构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对东北地区23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展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到市场需求、政府支持、特色资源、人力资本、组织动员、协同创新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采取三条路径，分别是“人力资本—协同创新”驱动路径、“市场需求—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路径和“政府支持—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路径，为在不同情境下发展乡村产业提供借鉴。基于此，提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健全“项目进村”制度设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产业带头人培育、推动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源基础理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5)06-0056-1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内生动力。《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进一步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因此，推进乡村振兴要着力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学界关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何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其内涵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张军扩等，2019)。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应是以农业科技进步为主导的创新发展、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协调发展、聚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瞄准“双循环”的开放发展、追求产业富民的共享发展(匡远配和彭云，2025)。二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如从产业结构、组织体系、要素结构、价值取向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王瑞峰和曹吉峰，2025)，或从产业效益、产业融合、产业创新、产业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加以评价(钟晓华，2023)。三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如数字普惠金融(葛和平等，2025)、电商(王月等，2025)、田园

*项目来源：辽宁省教育厅2023年度基本科研重点攻关项目(JYTZD2023129)。

作者简介：王海龙，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发展、科技管理。

通信作者：代兴梅，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农村发展。

综合体建设试点（曹先磊和任云鹤，2024）等要素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四是如何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学者聚焦乡村体育产业（陆东东等，2024）、乡村康养产业（贾俊丽等，2025）等某一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也有学者以整体视角分析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从政府与市场协同的角度对四川三州地区重点帮扶县乡村产业发展开展案例研究（史敦友和韩立达，2024），或运用扎根理论对全国乡村产业发展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王瑞峰和李爽，2022）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涌现出许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但仍有很多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不高。缘何在同一战略背景下，不同乡村的产业发展出现了显著差异？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机制有哪些？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比较单薄。本文旨在识别影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及各类因素如何通过组合发挥重要驱动作用，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分析视角上，以资源基础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资源—能力”互构的分析框架，关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各类资源和能力的可及性。二是在分析方法上，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且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也可能促成相同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结果。因此，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归纳总结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可行路径。三是在案例调研上，已有相关研究多是基于既有统计数据，通过文本分析归纳条件变量并加以测量。本文在我国东北地区展开实地调研，通过半结构访谈法获取一手资料，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资源基础理论的核心议题在于，组织通过有效获取和科学配置资源以提升自身绩效。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传统资源基础观—动态资源基础观—资源行动观”（张璐等，2023）。传统资源基础观强调异质性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认为组织是资源的集合（Penrose，1959），拥有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Barney，1991）；动态资源基础观引入能力维度，探讨组织如何获取和运用异质性资源，关注组织构建、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助力组织创造产品和流程以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Teece et al.，1997）；资源行动观则聚焦组织获取和运用资源的具体机制，先后发展出资源拼凑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资源拼凑理论主张重新组合组织内部原本不被重用的资源进行包容式创新（Garud and Karnoe，2003），并通过网络拼凑寻求外部资源（Baker，2007）。资源编排理论主张采取协同、链接、丰富的资源行动进行资源编排（Cui et al.，2017）。可见，资源基础理论经过发展演化，在“资源”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能力”维度，为组织如何获取、配置资源以提高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同时还应关注到，随着组织资源的不断丰富，其获取、配置资源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强化，形成“资源—能力”互构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适配性。首先，资源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起点。发展乡村产业需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乡村内外部资源。其次，并非所有乡村都先天或始终具备充分的产业发展资源，相关主体应积极主动地向外争取、向内动员，以丰富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并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编排，使其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最后，资源与能力相互建构，不同资源情境涉及不同能力的运用，而能力的调适又将带来资源情境的改变，在渐进中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资源基础理论关注资源与能力间的互动，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微观层面，有助于揭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二）分析框架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确定了影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与能力两个维度，进一步地，资源维度

可以划分为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能力维度可以划分为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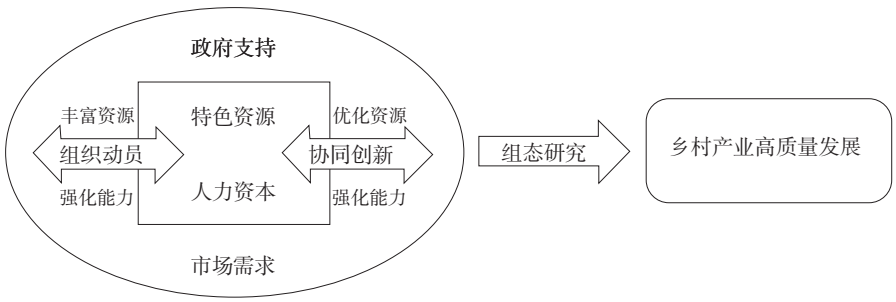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外部资源指生成于乡村场域之外，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力量和环境，包含市场需求和政府支持两种资源。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下，发展乡村产业要顺应市场发展规律。对乡村产业而言，市场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本上是要把握市场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韧性，推动各类经营主体积极主动融入市场。另一方面，发展型政府理论对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尤其在起步阶段，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夯实基础、引导方向。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展开的必要前提，对于交通、仓储等流通性基础设施和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乡村自身难以实现资源的集聚，需要政府投资来盘活乡村资本市场。同时，乡村产业常面临经营主体分散、抗风险能力弱、科技能力不强等局限性(梁伟，2025)，通过政府补贴、补助的方式，有助于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保障农民收入平稳增长，引导乡村调整产业结构。

内部资源指内生于乡村场域，能够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涉及特色资源和人力资本两类资源。目前我国乡村大多处于以当地资源为依托的发展阶段，乡村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乡村产业发展方向与模式的选择具有直接作用(李玲燕等，2022)。自然资源为发展乡村产业提供主要原材料，而资源的异质性有助于增强乡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通过人力资本推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构建。当前我国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高端人才来乡返乡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人才短缺已然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掣肘，积累人力资本是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争得先机的重要举措。

资源获取能力指乡村产业的组织者或带头人依凭自身的社会网络、声望地位、游说能力对乡村资源进行组织动员的能力，尤其体现为对农民的组织，即动员村民以各类生产要素参与乡村产业，盘活乡村存量资源，促进农民抱团式发展，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资源配置能力指对既有资源进行协同创新，以最大化利用资源的能力。在乡村产业振兴语境下，资源配置能力主要表现为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将更多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根据《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单》《2023年辽宁省乡村振兴示范带创建名单》等在东北地区确定了23个调研地。2024年5月至2025年5月，课题组开展实地调研，与镇村干部、产业负责人、村民等92人展开半结构式访谈，并结合政府文件和官方媒体报道内容，以保障案例内部知识的

充分性和真实性，支撑研究过程中对各项变量的测量。案例样本的选取坚持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则，由此呈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空间分布的广泛性。案例样本广泛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16个地级市，能够考虑到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上的差异。二是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案例样本涉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考虑到不同案例在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三是产业类型的多样性。案例样本涵盖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考虑到不同案例在产业类型上的差异。

（二）变量及赋值

1. 结果变量

本文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结果变量。农民增收致富是发展乡村产业的根本目标，参照沈国琪和陈万明(2023)的研究，通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测度结果变量。

2. 条件变量

条件变量数量的确定要考虑案例的数量和分析结果的简约性。对于10~50个的中等规模样本研究，理想的条件变量数量在4~7个之间。本文选取了23个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将条件变量设置为6个，并运用理论视角法和文献归纳法(张明和杜运周，2019)确定了市场需求、政府支持、特色资源、人力资本、组织动员和协同创新6个条件变量。

(1)市场需求。产销率指一定时期内已销售产品数量与同期生产产品数量的比值，是反映产品被市场接受程度、把握市场需求的重要指标。故通过产销率测度市场需求。

(2)政府支持。财政资金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粮草军需”，也是撬动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的重要杠杆。故通过政府资金支持测度政府支持。

(3)特色资源。乡村具有的特色资源是发展乡村产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据。衡量乡村特色资源既要看规模总量，也要看人均占有量。故通过特色农业一产人均年产值测度特色资源。

(4)人力资本。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举措，学历层次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人力资本。故通过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占乡村从业人员比重测度人力资本。

(5)组织动员。农民组织化是盘活乡村存量资源、更好对接市场的有效途径。因此，发展乡村产业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要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有机衔接。故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农户数占乡村总户数比重测度组织动员能力。

(6) 协同创新。发展乡村产业重在深挖农业价值潜能，多措并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故通过农产品附加值率测度协同创新能力。变量测度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测度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单位)
结果变量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条件变量	市场需求	产销率(%)
	政府支持	政府资金支持(万元)
	特色资源	特色农业一产人均年产值(万元)
	人力资本	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占乡村从业人员比重(‰)
	组织动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农户数占乡村总户数比重(%)
	协同创新	农产品附加值率(%)

校准目的是赋予案例以集合隶属，常见的校准方法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本文采用直接法，根据样本数据的95%分位数、50%分位数和5%分位数确定了“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三个锚点。变量校准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校准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单位)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万元)	4.18	2.60	1.62
条件变量	市场需求(%)	100.00	99.00	98.00
	政府支持(万元)	2 980.00	700.00	200.00
	特色资源(万元)	7.60	1.00	0
	人力资本(‰)	4.82	2.80	1.00
	组织动员(%)	89.00	50.00	20.00
	协同创新(%)	64.50	25.00	5.50

(三)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提出，该方法整合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优势，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为因果复杂性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撑，适用于大、中、小样本的分析，具有可复制性和普适性。fsQCA将模糊集与QCA结合起来，能够处理变量在程度上的变化，使得分析结果在实证上更加紧缩和精确。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呈现出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且这些影响因素在测量上难以作非彼即此的绝对化处理，而是存在着部分隶属关系，因此适用于fsQCA。本文运用fsQCA对我国东北地区23个乡村产业发展案例进行分析，以期获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

四、实证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在组态分析之前，需要对每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一般而言，如果一致性大于0.9，则初步说明该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如果覆盖度大于0.6，说明该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运用fsQCA3.0软件对6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得到一致性和覆盖度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6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无论是在高水平上还是低水平上均未达到0.9，表明其均不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分析的结果表明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复杂性，它是市场需求、政府支持、特色资源、人力资本、组织动员、协同创新等条件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有必要对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以进一步分析其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二)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即是对条件变量组合的分析，探究各条件变量如何通过组合和共同作用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般认为条件组态分析的原始一致性阈值的设置不低于0.75，PRI一致性阈值的设置不低于0.7。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案例频数设置为1.5，得到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三种解，随后将中间解作为条件组态分析结果，并结合简约解确定条件组合中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最终得到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5种组合，如表4所示。在QCA分析中，整体解的覆盖度越接近于1，表明条件组合的解释力度越大；整体解的一致性不能低于0.8，且越接近于1表明条件组合间的联系越好。本文中整体解的覆盖度为0.733，即能够解释所选全部案例中的73.3%，一致性为0.996，满足分析要求。

表3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市场需求	0.717 578	0.849 201
~市场需求	0.580 633	0.682 255
政府支持	0.751 145	0.925 740
~政府支持	0.529 736	0.598 806
特色资源	0.716 700	0.953 638
~特色资源	0.687 513	0.727 905
人力资本	0.630 931	0.931 519
~人力资本	0.619 568	0.608 172
组织动员	0.805 175	0.984 589
~组织动员	0.600 565	0.683 800
协同创新	0.774 867	0.872 467
~协同创新	0.520 836	0.644 664

注：“~”表示条件变量在低水平方向上的表现。

表4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组合1	组合2	组合3	组合4	组合5
市场需求	●	●	●	⊗	●
政府支持	●	●	⊗	●	⊗
特色资源	●		●	●	⊗
人力资本	●	●	⊗	⊗	●
组织动员		●	●	●	⊗
协同创新	●	●	⊗	⊗	●
原始覆盖度	0.402 259	0.404 398	0.288 624	0.212 523	0.268 463
净覆盖度	0.009 247	0.049 554	0.102 058	0.092 324	0.055 527
一致性	0.996 347	0.996 366	0.992 393	0.989 460	0.994 536
整体解覆盖度			0.733 432		
整体解一致性			0.996 923		

注：实心圆圈“●”表示条件变量存在，带有叉号的圆圈“⊗”表示条件变量不存在；大圆圈表示该条件变量为核心条件，小圆圈表示该条件变量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条件变量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三）稳健性检验[①]

QCA 研究由于面临着参数设定威胁和模型设定威胁而经常被批判研究结果具有敏感性和随机性，因此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一是将原始一致性阈值从0.8调整至0.85，拟合参数和集合关系状态均与调整前保持一致；二是随机删减掉2个案例，集合关系状态与调整前保持一致，一致性由0.997下降至0.996，覆盖度由0.733下降至0.712，拟合参数基本保持一致，由此说明条件组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组态路径分析

观察条件组态分析得到的5种组合，组合1和组合2的核心变量一致，且包含于组合5的核心变量集合，与组合3、组合4彼此之间则不存在包含或被包含关系，由此总结出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① 囿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展的3条路径，即“人力资本—协同创新”驱动型、“市场需求—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和“政府支持—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并选取全部样本中3个典型案例具体分析。

（一）“人力资本—协同创新”驱动型

在“人力资本—协同创新”驱动型的案例中，乡村依凭较强的人力资本不断推动协同创新，实现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应表4中的组合1、组合2和组合5。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B村是该路径的典型代表。B村原以传统的玉米种植为主，村民收入增长缓慢。随着4名大学生返乡创业，协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强化。以合作社为依托，B村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对接合作，确定西蓝花作为产业发展方向，优选西蓝花品种，实现一年两茬种植，提高了生产质量与效率，并注册商标，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进一步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同时，B村坚持科学种植，探索创收渠道，实现农业增值。如通过试验开展良种良法配套的复合种植，有效提高了亩产效益；利用玉米秸秆加工青贮饲料，促进了种养循环和资源利用；发展订单农业，在订单保障下扩大产量。相较而言，B村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未从政府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对科学技术和机械的运用，深挖农业价值潜能，推动农产品生产效率和附加值不断提升。

（二）“市场需求—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

在“市场需求—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的案例中，乡村瞄准市场需求，基于特色资源将村民广泛动员起来，实现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应表4中的组合3。

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C村是该路径的典型代表。C村的独特气候适宜药材生长，如龙胆草药物含量一般要求为3.3%，而该村龙胆草药物含量可达3.8%，故而具有显著优势。但由于龙胆草的种植成本高、生长周期长，加之村民对市场需求的担忧，C村此前并未实现大规模种植。J接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一方面加强组织动员，带头种植龙胆草等中药材；号召村干部和致富能手牵头成立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组织村民到外地参观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拓宽视野；逐门逐户展开入户调研，了解村民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鼓励种植龙胆草。另一方面开发市场，在产业发展初期多次前往南方省份，参加农产品展销会，调研市场、寻找买家。经过前期的不懈努力，村民纷纷参与龙胆草种植，目前种植面积达到8 000亩，并实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价格、统一销售。同时通过线上药材交易网站发布销售信息，使本村成为龙胆草销售集散地，占据全国龙胆草销售份额的83%。C村的案例表明，在发展乡村产业的过程中要通过市场开拓和适度规模经营等方式充分发挥异质性资源优势。而市场需求和规模效应不会凭空产生，需要乡村产业的组织者或带头人主动建构。

（三）“政府支持—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

在“政府支持—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的案例中，乡村在政府的支持下，基于特色资源将村民广泛动员起来，实现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应表4中的组合4。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X村是该路径的典型代表。X村人多地少，过去由于未能找到契合的乡村产业，村民收入多数处于贫困线以下。村主任Y受附近林场启发，认识到当地昼夜温差大、湿度大，具备种植黑木耳的独特气候。在镇政府的组织下，Y带领村民外出学习，由此开始了黑木耳的种植道路。在经历自然灾害的打击后，Z组织村民发展设施农业，改地栽木耳为棚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支持下，建立起规模化的食用菌产业园区，配套建设了菌种实验室、养菌房、晾晒场、分选包装车间等基础设施，带动全村400多户村民从事木耳生产。如今X村已多次跨入“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行列。X村的案例表明，发展乡村产业要善于把握自身的异质性资源，以此为基础动员村民参与，实现规模经营。在此过程中积极寻求政府支持，完善基础设施，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提供坚实支撑。相比于“市场需求—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路径，“政府支持—

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的影响更为显著，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样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已有相关研究，构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对我国东北地区23个乡村产业发展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乡村产业发展受到市场需求、政府支持、特色资源、人力资本、组织动员、协同创新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丰富乡村内外部资源，并持续提升乡村的组织动员与协同创新能力。同时提出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三条路径，一是“人力资本—协同创新”驱动路径，该路径表明要不断厚植乡村的人力资本，加强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的应用，推动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二是“市场需求—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路径，该路径表明要把握住乡村的异质性资源，积极开拓市场，并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不断提高市场份额；三是“政府支持—特色资源—组织动员”驱动路径，该路径表明发展乡村产业要契合特色资源，并将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二）政策建议

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一方面要善于挖掘和把握乡村的异质性资源。部分乡村未能发展起特色产业，并不必然意味其不具备异质性资源，而是乡村产业与特色资源不相契合。为此，应重视对乡村自然资源禀赋的分析评估，加强村民与外界的交流学习，拓宽其视野，经综合研判确定适宜本乡村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既强调明确自身所具备的异质性资源，也要求乡村在不具备异质性资源的情况下探索适宜自身产业发展的道路。如着力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通过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发展设施农业、推动智慧农业等方式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健全“项目进村”的制度设计。分税制改革后项目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资金进村的重要形式，在改善乡村内外部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资源和注意力的有限性，这些项目并非均质地分配到各个乡村，需要乡村主动争取。政府在鼓励乡村争取项目的同时要优化项目内容，注重发挥项目对乡村“输血”及“造血”功能；加强项目评估，确保规划的切实可行；强化项目监督，避免为获取短期利益而套取项目、挪用资金。以此提升项目制实效，实现政府与乡村的互利互惠，推动乡村产业“滚雪球”式地发展壮大。

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产业带头人培育。基层党组织和乡村产业带头人是乡村组织动员与协同创新的主体力量，党建引领有助于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优势，乡村产业带头人则能够依托其社会网络和能力素质不断积聚并创新运用资源。为此，要选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充分挖掘乡村产业带头人，加强其能力素质培训，为其提供必要支持，助力其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从而提升乡村组织动员与协同创新能力。

四是推动建立联农带农机制。一方面要面向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起差异化的联农带农机制。提升合作社的规范化水平，建立进入和退出机制，打造“公共话语场”（唐任伍和李水金，2007），提高村民话语权。出台明确的奖励办法，通过现金奖励、税收优惠等举措鼓励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带动小农户以多种要素参与到乡村产业中，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提升产业经营能力，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受小农思想等影响，部分村民组织化意愿不高，尤其在产业发展初期。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加强对村民客观实际和思想状况的把握，制定差异化、有针对性的组织动员策略，渐次引导村民参与到乡村产业中。

参考文献

[1]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等.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 管理世界, 2019, 35(7): 1-7.

[2] 匡远配, 彭云.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演进逻辑、阶段性特征与路径创新[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4): 22-31.

[3] 王瑞峰, 曹吉峰.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四维"协同度分析[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25, 43(3): 807-817.

[4] 钟晓华.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7): 67-72.

[5] 葛和平, 王佳昊, 姚亦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J]. 经济问题, 2025(5): 79-88.

[6] 王月, 霍学喜, 阮俊虎. 青年电商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5(3): 67-78.

[7] 曹先磊, 任云鹤.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促进了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吗?[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4, 36(4): 35-48.

[8] 陆东东, 刘庆群, 张禾. 乡村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内涵诉求、现实困境和优化方略[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4, 39(2): 183-189.

[9] 贾俊丽, 唐玲, 贾新平, 等. 江苏省乡村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对策[J]. 江苏农业科学, 2025, 53(2): 271-279.

[10] 史敦友, 韩立达. 政府与市场协同: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路径——以四川三州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例[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4(5): 9-17.

[11] 王瑞峰, 李爽.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基于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例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2): 24-36.

[12] 张璐, 王岩, 苏敬勤, 等. 资源基础理论: 发展脉络、知识框架与展望[J]. 南开管理评论, 2023, 26(4): 246-258.

[13] 梁伟. 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衔接机制——以D省S市蔬菜产业振兴为例[J]. 决策与信息, 2025(10): 42-52.

[14] 李玲燕, 裴佳佳, 叶杨. "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下乡村典型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0): 220-231.

[15] 沈国琪, 陈万明. 要素组态形式如何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44个乡村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林业经济, 2023, 45(12): 54-74.

[16]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17] 唐任伍, 李水金. 中国农民话语权实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中国行政管理, 2007(5): 45-48.

[18] Baker T. Resources in play: Bricolage in the toy store(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7, 22(5): 694-711.

[19]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20] Cui M, Pan S L, Newell S, et al. Strategy,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e-commerce enabled social innovation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 26(1): 3-21.

[21] Garud R, Karnoe P. Bricolage versus breakthrough: Distributed and embedded agency 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2): 277-300.

[22] 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 509-533.

（责任编辑：肖舒苑）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WANG Hailong[1], LI Yingjie[2], DAI Xingmei[2]

(1.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66,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66, China)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s the path that should be pursued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existing researc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b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Field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23 rural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s jointly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e market demand, government support,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re are three path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human capital-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riven path, the 'market demand-characteristic resources-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driven path,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driven path. Thes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rural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On this basis,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e developing rur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rojects entering villag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leaders, and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chanism to connect and benefit farmers were proposed to enrich and strengthen th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for developing rural industries.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resource-based theory;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